

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全球金融框架？如何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参加“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的嘉宾们建议——

构建国际金融新框架

本报记者 王信川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路透社中国编辑鲍比尔(从左至右)在“重写全球准则手册”分论坛上。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形成巨大冲击。“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特别举行了一场主题为“重写全球准则手册”的分论坛，吸引了不少与会嘉宾的关注。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总体上看，近几年来金融监管的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更加关注全球共同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并力求制定一整套金融监管的新标准和有效执行模式，促进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阎庆民认为，全球金融监管应当制定统一的标准，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金融体系的差异性很

大，还应给予各国适合国情的自由裁量权。“有的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有的以资本市场为主，即一种是债务融资，一种是股权融资，在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下，金融监管制度也应有所不同。”阎庆民说。

“一个方案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金融监管应有一定的灵活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表示，推动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基本的监管准则，既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也要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一样，在新兴市场国家大力推动下，特别提款权(SDR)的权重已经有所调整。”

蒙代尔认为，未来SDR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共同组成，甚至可以用SDR取代美元来发行新的世界货币。“争

取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但前提是人民币必须实现可自由兑换。”蒙代尔说。

监管法规和手段应调整

“同2000年相比，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明显增强，但这主要不是因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说，各国央行的货币调控更为灵活，大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式来对冲流动性，尽管许多央行的操作手续仍面临一定的争议。

李稻葵认为，许多金融监管新规不具有针对性，未能真正有效引导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而这还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目前来看，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仍有很多不足，金融监管法规和手段还应有所调整。”李稻葵说。

谈到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阎庆民认为，除了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地方政府还有政策性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发行债券等融资渠道，而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方面，银监会持续加大了监管力度，可以有效缓释和化解融资平台贷款风险。

“就‘影子银行’来说，中国的情况跟欧美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阎庆民说，诸如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理财等信用中介机构都已纳入监管体系，并受到严格监管，“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完全可控。

“中国的杠杆比率在上升，这是一个事实，但目前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李稻葵说，中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储蓄总额超过了GDP的50%，巨额的储蓄会进入不同的投资渠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杠杆比率上升。“对此应保持警惕，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改变其投融资模式。”李稻葵说，地方政府应当开辟新的税源，从而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动辄向商业银行借钱。

人民币“走出去”势头良好

有关人民币的话题也很热。蒙代尔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实体，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市场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和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是否可自由兑换，这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把外汇储备总量逐步降下来，从而让人民币能够真正‘走出去’。”李稻葵说，在外汇储备降低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一定空间，既能让境内的资本流出去，又能让外部的资本进来，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助于加快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

在6月8日举行的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企业风险与气候变化”分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透露，中国首个碳交易将于18日在深圳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在碳排放交易领域迈出的标志性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碳排放市场大步跨入活跃期。

解振华说，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经过多年的谈判，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到2050年全球升温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共识。为完成这一目标，全球许多国家都把推动转型发展作为当前重要的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方兴未艾。

英国艾铭CEO萨米尔·布里科指出，在全球气候异常现象越来越频繁，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企业还在等待观望，仍未重视全球气候变化，这种做法只会拖延时间。

“这种现象恰恰说明有些企业太注重眼前利益，反而忽视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商业价值。”远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跃对此点评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每一个企业的共同责任。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不应将其视为“赔本买卖”，而要挖掘其中的商业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张跃介绍说，远大集团始终把推进节能减排作为重要的业务发展方向，并不不断加大在这个领域的研发投入。目前，公司在节能建筑方面已经取得许多突破，不少绿色技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很小，有些甚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发展与环保共赢

——“企业风险与气候变化”分论坛侧记

图/文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解振华表示，在引导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中国政府告诉企业，到“十二五”末，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将达到1.8万亿元，在整个节能减排领域的市场空间将达到6万亿元。这种积极的商业信号，对于提高企业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商机发现能力值得很多企业家学习。”艺康董事长道格拉斯说，无论从商业价值考量，还是社会责任的角度看，企业都应把绿色发展的因素考虑其中。尽管一个公司实践未必能改变全球气候格局，但只有每个企业都行动起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完成。

道格拉斯指出，为推动企业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政府应该以更加明确的态度和更加稳定的政策，引导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大资金投入、技术科研投入。

解振华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政府和企业都要在技术创新方面增加投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应该共同研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解决好未来的技术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与会者还建议，政府应加快相关立法，明确节能减排目标，履行好监管责任，通过强制性办法和税收、价格政策相结合，督促企业履行节能减排的义务。

新希望集团——

坚持做麦田守望者

本报记者 李春霞

来自成都的本土企业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是财富全球论坛上的活跃人物。他刚卸任旗下最大股份公司董事长职位，接班的女儿刘畅在论坛上同样表现抢眼。未来新希望集团如何发展，备受瞩目。

“新希望要坚持做麦田守望者，我的梦想是将集团打造成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刘永好回答得很肯定。

在农牧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刘永好，谈起中国农业的未来，表情有些许凝重。城镇化使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种地成为副业，农民工正从农产品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既给农牧企业带来很大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小农”转向“大农”的机会。“公司、农户、农场互为协调的规模化生产体系是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也是食品安全的根本保证。”刘永好指出，目前家庭养殖存在基础设施不足、规模小、监管难的问题，实现规模化后便于增长也便于监管。此次禽流感发生后，新希望集团公司所属的农业合作社、规模化养殖场的鸡鸭以及工作人员中无一例感染禽流感。他说：“这说明规模化养殖是科学的，经得起考验的。”

卸任后准备做什么？刘永好表示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司未来战略上。“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险管控。我下一步是多走走看看，到国际大企业去看，学习行业怎么变革，世界级企业如何打造。”

看好成都 看好中国

——访美国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

本报记者 陈颀

正在成都参加财富论坛的美国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6日在成都表示，通用电气在成都正式启动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响应中心”，致力于引领医疗行业迈入工业互联网时代，让智能化的医疗关爱惠及更多民众。

伊梅尔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成都是通用电气成立第一家GE全球客户创新中心的所在地，这个区域充满着无限活力和机遇。在成都成立第一座GE全球客户创新中心，是因为GE的业务重点包括医疗、石油天然气等，与四川省的“十二五”规划发展重点是一致的。四川省的发展重点之一就是医疗，预计在2015年前四川将会增加17个三级医院，并计划要标准化223座镇级医院和2396座村级卫生站。另外，四川地区页岩气

储量丰富，当地较为活跃的页岩气勘测活动对GE而言意义重大。“我们的客户希望得到更多本地的团队支持，希望我们提供更多适合本地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GE的创新和研发活动将帮助四川在2015年达到50%的经济增长来自高科技创新的目标。”

伊梅尔特强调说，GE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所具备的经济潜力很有信心。中国市场的改革与成长令人感到特别鼓舞，这对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也会带来正面的影响。GE相信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在内，都将维持其稳健表现。GE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相信中国能够在成长过程中，维持其整体竞争力，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

如何看中国和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态势？GE会加大对中国尤其是中西部的投资吗？伊梅尔特认为，投资决策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与主要客户和合作伙伴之间的距离、人力资源的可行性，以及供应链条件等。GE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历史已超过百年，在中国的发展也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不断变化。GE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中国市场目前的需求与GE在基础设施、航空、能源和医疗等领域的特长非常吻合。

伊梅尔特认为，中国希望通过研发、设计及创意的关注在价值链方面更上一层楼，成长模式正从“数量”导向转为“质量”导向。而由创新带动的成长和高端制造业将会提升中国未来的竞争力，本地丰富的工程与信息科技人才



美国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

也将促成此目标。GE相信工业互联网的风潮将会启动生产力的革命。如果可以将中国在发电和飞机发动机领域的智能机器所产生的数据加以收集和分析，将有机会大幅提升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工业互联网有能力支持中国经济从低成本制造业为主向以科技与服务为导向的转型，而透过机器效率的最大化，GE也将拥有更多人力聚集在创新与高科技领域工作，与中国经济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杜邦大中国区总裁苏孝世

在成都播下协力创新的种子

——访杜邦大中国区总裁苏孝世

本报记者 陈颀

能支持此次论坛在成都举行。”

杜邦自1984年进入中国，已在国内成立了40余家分支机构及一个综合性研发中心。2012年8月16日，杜邦成都分公司成立，这是杜邦首次布局中国西部地区。苏孝世清楚地记得那个让他振奋的日子，他说：“杜邦设立成都分公司是一个战略性的布局，是希望在成都这个西部制高点播下一颗种子，把根扎下去。中国西部是杜邦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里有杜邦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随着成都分公司的成立，杜邦将继续加大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投入。”

苏孝世向记者强调，杜邦的理念是，客户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成立成都分公司是杜邦支持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本土伙伴携手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又一举措，揭开了杜邦在中国开展“协

力创新”的又一页。对于杜邦而言，成都代表着通向西部市场的桥头堡，是开拓创新的沃土。这里有潜力无限的农业与食品市场、成熟的汽车生产基地、雄心勃勃的新能源发展计划以及广泛运用在航天、交通基建和3C市场领域的先进材料。“我们希望借助当地综合优势、研发能力和人才资源，与合作伙伴协力提升本地化创新，更好地服务中国西部市场。”苏孝世表示，杜邦在成都设立分公司不只是做销售，还要向客户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

杜邦在成都播下的不仅有业务种子，还播下了一批人才种子。苏孝世告诉记者，杜邦中国研发中心在成都分公司开业的当天与四川大学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这正是杜邦对“协力创新”倡议的具体践行。

